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3.007

胶东抗日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管勤积

(鲁东大学 盈科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干部队伍建设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战时环境的残酷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干部荒”的现象。为了健全干部队伍,发挥干部在抗日与革命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来完善干部队伍,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队伍建设体系。这套干部队伍建设体系既包括干部的配置、培养、提拔,也包括干部的奖惩、干部的调剂、干部的培训等,内容十分广泛。这不仅对于发挥干部的骨干作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共产党政策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基层,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胶东抗日根据地;干部;中共;选拔;培训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3-0044-11

高质量的干部队伍是党在战争年代发展壮大的保证,也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美国学者沙培德的一段论述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毛泽东是最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其作品构成了某种后来理论著作不得不追奉的神圣经典。他的观念通常既原创又富有洞察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塑造了干部,干部塑造了党,而党将塑造中国。它们尤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1]383}

在战争年代,干部不仅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是党在乡村基层社会的代表与形象,是民主革命政权的重要基石,而且还面临着敌伪残酷迫害的危险,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干部是革命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重要保证,因而中共在广大根据地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选拔与任用。对于战时中共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学术界已有了一定的研究^①。

一、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对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干部情形,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

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2]526}

对于缺乏干部及干部的重要性问题,中共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有着清醒的认识。1940年朱瑞同志指出要大量提拔党的干部,应该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路线^{[3]338-353}。在提拔干部时一方面要注意成分,以加强干部的工农成分,但同时不要过分强调成分问题,应着重于政治质量与工作能力^{[4]424-441}。1942年中共胶东区党委就强调“干部政策是一切工作的中心”^{[5]188}。为了克服干部流动给地方工作造成的损失,胶东区党委也非常注重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县以下干部工作岗位的稳定性问题,其规定:(1)原则上

收稿日期:2022-1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胶东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研究”(19FDBJ005)

作者简介:管勤积(1980—),女,安徽宣城人,社会学硕士,鲁东大学法学院讲师。

^①主要成果有吴盈民的《抗战时期干部选用政策及其对当前军队干部选拔的启示》(《党史文苑》2015年第8期),吴晓亮、吴敏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王鹏的《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变迁分析》(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汤涛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妇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经验及启示》(《党的文献》2015年第2期),薄谊萍的《延安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稳定书记或组织;(2)应是地方干部;(3)熟悉全部工作的干部;(4)支部中心干部最少一人,分区最少二人;(5)稳定时间,县级最少一年,分区级最少十个月,支级最少八个月^[3]³³⁸⁻³⁵³。

干部在党与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异常缺乏的,从而出现了一定的“干部荒”现象。在1941年,中共山东分局指出目前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主要有三个困难:(1)干部缺乏。如××区一个地委缺少支级以上干部二千四百多。(2)流动性太大。(3)干部提拔太快,党员脱离了生产就成了干部^[4]⁴²⁴⁻⁴⁴¹。1943年在中共胶东莱阳县仅党的组织干部就缺少九个^[3]³⁹³。这种情形的存在,造成党在根据地工作不能深入进行,也不能在根据地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力。鉴于此,中共胶东区党委提出:不管是“新党员也好,即使候补党员也好,工作能力也好,不管怎的,一定要从现有党员里面找质量高的将干部全部提拔齐”^[6]。

1941年,中共山东分局除了有计划地大批培养教育干部外,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克服“干部荒”,加强干部储备,还提出了建立副干部制,作为培养干部、锻炼干部和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最好办法,在合适的时候使副干部升级^[4]⁴²⁴⁻⁴⁴¹。1940年10月,林浩指出,为了大批提拔党的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建立副干部是非常重要的^[7]。1941年,胶东区指出配备党的副干部,是培养提拔锻炼储备干部最好的方式之一,各级党(地委至支部)的领导机关于半年内一定要保证将副干部配备齐全。胶东区党委要求各县委组织部下设组织股、干部股、统调股,股长要有两个是工农干部,工作需要时酌设干事,以上干部尽可能都有副干部^[8]²²⁴⁻²⁵⁰。1941年胶东区党委在半年内副职干部配备了十分之二,分区级配备了十分之一,县级配备了十分之一。地委配备了4个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3人,兼社会部长的1人^[6]。副干部制的确立是战时中共为了克服干部不足而采取的一种非常规的措施,这一制度的设置对于解决根据地党的干部缺乏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副干部制的设置也反映了战时党对干部培养的重视,设置副干部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干部缺乏的压力,也可以使副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

胶东根据地对于干部提拔条件与方式有着明确的规定,其条件一般是:(1)与群众联系好的,能接近群众的;(2)政治上进步快,质量较好者;

(3)工作经历较长者(二、三年以上者),而且工作能力较好者;(4)前途远大之青壮年干部。提拔干部的方式针对区级干部主要是采用了建立副职以及由其他部门转化之(主要是分区委书记)的办法;其次是无办法建立副职的,即由村中提拔较好的村干部,以带徒弟的方式,逐渐培养提拔。对区干事和村级干部的提拔在村级也强调建立副职,以培养干部;再就是用民主选举的办法,通过群众选出来的,如要其脱离生产的,同样是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养^[9]。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由于环境的险恶,中共非常注重对灰色干部的培养,以防止敌伪顽对党的干部的残害。对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灰色干部的选择,中共是十分慎重的,既要考虑到他的党性又要考虑到他的工作能力,如1942年牟平县委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灰色干部的培养与提拔的条件如下:(1)政治坚定,忠实于无产阶级;(2)善于团结群众;(3)机动灵活;(4)党性成分出身比较好^[10]。

胶东区党委特别强调在提拔干部时要着重考察其德资才,特别是以德资为重。对于中心干部首先要根据德资才的原则及热爱该地工作情形来确定中心干部(书记、组织、宣传),其次再根据各方面的情形配备其他干部。对于区级以下的干部大多数实行地方化,即便有的不是该地人,也必须是在该地附近及经常在该地的工作者^[11]。

我们从胶东各级党组织对党的干部提拔的指示与文件来看,中共对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一方面注重干部的出身、身份、在战争以及具体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是以适应具体实际情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干部,培养提拔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

中共还注意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培养、选拔干部。正如胶东区党委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培养各种英雄模范,群众领袖,使其成为干部的主要来源。”^[6]岳谦厚认为:“中共对基层权力主角的重塑,不仅是对旧政权的彻底改造,更主要是通过村选使符合中共要求的‘群众代表’成为新的乡村领袖。”^[12]²¹1941年荣成党组织在反“扫荡”时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训练与提拔,其中县级1名,区级61名,中支57名,分支40名,共计159名^[13]。东海在1941年上半年进行干部提拔,其中到县级地委分配工作51个,区级52个,支委级68个,共计171个,其中文登最多97个,牟海次之27个^[13]。在北招县埠山区1947年保田运动

中一个月内提拔了支书6名,组织委员2名,宣传委员2名^[14]。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同时根据战时形势发展的需要,胶东区党委对干部实行了统调安排,以确保其在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1941年底,牟平县委决定,“统调干部的配备,在划区时将过去的统调干部都配备区级组织干事,二区的统调干事配备区级组织,统调工作由区级组织负责做”^[15]。

为了解决干部荒问题,增强干部的交流,中共胶东区党委往往还根据实际情形对干部队伍进行调剂。北招县在1940年划界时干部都是从南招、蓬莱、莱阳等地调入的,本地干部很少。至1944年,在县级干部19人中,外县的占11名;在区级干部58名中,外地干部占6名。留下的外来干部过去多是生活在偏僻的农村里,大多朴素,在老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16]。

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在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一度在工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为了保证外来干部的安全以及利于开展党在乡村的工作,1943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强调指出:“他们与群众联系很差,不但影响工作开展,特别在环境转化下坚持工作必将发生困难。”^[17]¹⁰⁰ 因此要使外来干部地方化,从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社会环境,到完全与当地群众结成血肉联系,首先做到的是要与当地干部密切团结。

战时中共为了保证干部的安全,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秘密干部,制定了秘密工作原则。山东分局规定,秘密干部的布置原则是要适时、及时、短小精悍。秘密干部配备的条件是:(1)地方干部;(2)熟悉当地情况和当地工作;(3)政治上坚定可靠。秘密工作的工作原则是:(1)不参加机关的公开活动;(2)参加秘密会议,如果不能参加可用个别谈话或看会议记录的方式了解工作;(3)要参加实际领导,潜伏着领导工作,活动应尽量不暴露;(4)分头领导,不发生横的关系。县以下一律布置秘密工作,配备秘密干部要及时地检查^[18]²⁸⁻⁴⁰。

北招县对于秘密干部不仅要求绝对保密,并且还要求必须有其他职业做掩护,在工作的布置上都是单独布置,其工作不与其他地区发生关系^[16]。牟平县委对党的秘密工作经常进行督促检查,主要表现在下乡的同志服装大众化,行李轻装,除学习材料外,不带过多文件,地方同志(秘密地方)活动时多半是晚间活动。下乡的工作队

同志,除在党内传达有关秘密文件外,并随时随地谈秘密工作方式以及不秘密工作的损失,使每个同志要严格注意,除以上布置外,还根据不同地区个别布置^[11]。

为了更好地保护党的干部,充分发挥干部的效能,中共胶东区党委还对干部做了一些战时的特殊规定。林浩指出,由于胶东党委在过去配备干部时没有注意地方化的问题,从而导致党的干部伤亡大,工作不深入,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在配备干部时强调地方化是主要的,“外来的和尚能念经”是不对的。同时注意对干部的适当调整与调动,中共胶东区党委指出,“插天飞”“货币流通”的干部政策是错误的^[19]¹⁰⁶⁻¹⁴⁶。1941年,中共胶东区党委要求在分配干部时坚持执行干部地方化,尤其是区乡级干部^[8]²²⁴⁻²⁵⁰。1946年1月,中共胶东区党委要求在新解放区大量提拔本地干部,提拔干部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破除“本地无人可提拔为干部”的错误观念^[20]²⁹⁶。

1942年,栖霞县在实际组织工作中意识到党的干部存在着不群众化、不职业化,组织形式无法改变的问题,因而在配备干部时要求必须地方化^[8]⁷⁰⁶⁻⁷⁴²。1944年,黄县在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时要求下层党的干部职业化与地方化,克服干部的不群众化^[21]。胶东根据地对于干部的这些规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避免干部在复杂的战争与阶级斗争中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同时乡村社会相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又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具有相对的保守性与落后性,对外来事物及外来人员有一种天生的排斥感。因此,中共胶东区党委的这一政策也有利于党的干部在乡村社会开展工作与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建立与巩固。

1946年5月,陈少卿曾总结道:“1943年以后,虽已开始引起对干部工作的注意,提出建立干部工作机构,确定统一管理原则,并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有了目前这样一个干部工作的雏形。在干部工作上也渐有转变,从群众运动中培养提拔干部,及用工作队、轮训班、带徒弟、设副职、开总结会议、整风运动等方式来提高干部,均获得不少成绩与经验。”^[22]⁵⁷⁰ 正如邹谠所言:“在整个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也被用来摧毁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力以及在其支配下的中介社会结构。在破坏的过程中,党建立了新的群众组织,产生了新的积极分子。这些组织反过来成为新政治权力的地方机

构,新积极分子成为其中的干部。”^[23]¹¹ 干部体系在乡村基层社会的健全与稳定,对于中共向乡村社会渗透,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干部的审查

在战争年代,由于形势所迫和干部缺乏,因而需要快速大量地提拔干部。在这一过程中,干部队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对干部的审查便成为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对于审查干部曾作了如下指示:“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24]²⁶²

中共山东分局认识到,对干部的审查工作是一项自上而下的工作,应注意下级干部和党员群众的反映,应放在各级组织部干部中执行,以积累工作经验,要与各种工作联系起来,在工作中来了解干部,克服为审查而审查的现象^[18]²⁰⁸⁻²¹⁰。如1943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提出要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要在实际工作表现中考察干部^[25]⁴⁻⁶。

干部审查,必须由被审查的干部自己填写表格,并写详细的履历,然后由干部科工作人员与之作详细地谈话,对其履历中的重要环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等的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材料,根据上述材料进行精细的审查,并由干部科会议讨论得出结论^[26]⁴⁴⁴⁻⁴⁴⁷。干部履历也称为干部自传,在审干时内容极其详细,涵盖了干部的年龄、职业、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工作经历、革命经历等。

在审干之前,胶东区党委要求首先做好政治动员工作,使广大干部了解审查的意义,一般是采用两种方式:集体动员和个别动员。在根据地审查鉴定的方式一般是在小组会上进行的,也有划分临时小组的。审查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如在1942年4—6月牟平县委组织部就组织审查了36人,其中区级3名,余者都是县党训班之学员^[11]。

除了对干部出身成分进行审查外,在审干过程中还对干部的党性及工作中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审查与纠正。1941年10月,牟平在审查与鉴定干部过程中,检查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在干部中分散现象异常严重;好人主义;家庭观念;入党动机不纯

等错误倾向^[15]。

在1942年审干过程中,牟平县委组织部发现了如下问题:(1)干部不团结。二区宣传干部对特派员有意见,特派员对宣传有意见,书记对组织有意见。他们不在会议上批评,只是背后乱谈。(2)干部组织观念淡薄。如一区合子村韩×合(前任村支书,后任村政书记)三个多月没开小组会。(3)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一区泊儿村支书,以家长式领导,不采取其他人的意见,村中有被“二狗子”捉去的,他还说党员应纳钱去赎;二区姜格庄村支书(兼行政村支书)在收抚恤粮过程中明是民主,而事实相反。如纳粮人先提出意见纳多少,他说:老百姓你们愿意就举手,不愿意就不用举手。这样老百姓就不举手。他又说你再纳多少(数目)。他又说:老百姓,这会又纳多少你们还不举手吗?有的同志提议说,这不等于命令吗?他马上予以打击。他认为他是党的负责人,就高于一切。夜间,将村负责人召集一块睡,找自卫团给他站岗^[11]。这些问题都在审干的过程中经过斗争而得以纠正。

三、干部的教育与训练

干部培养与选拔方式因战时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战时干部队伍是良莠不齐的,在胶东干部队伍中就存在着诸种错误倾向与弊端,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等级地位观念严重,平均思想、享乐思想流行。胶东很多干部的等级地位和享乐主义观念严重,他们参加革命、入党的动机就在于谋求职位。在莱阳,许多干部同志认为自己的职份就该等于一个科长,但为什么发现自己没有呢?在实际工作中,很多老干部瞧不起新干部,认为他们才出来,斗争历史短,不知道什么,不信任他们^[6]。在抗战期间,牟平三区很多干部党员自视身份高,不愿意和群众划在一组^[15]。在黄县丰仪区,许多干部存在劳功主义,摆老资格,在工作上自满^[27]。威海县委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存在,干部往往“在领导上不深入,到下层不去接近下层,有些嫌基本群众脏,不愿接近,总在上层去交谈”^[28]¹⁹⁻²⁶。正如邵×光所检讨的那样,印满了一脑子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腐化,工作中官僚,个人英雄等^[29]¹⁹⁻²⁶。

第二,和平共居的好人主义思想严重,小资产阶级的调和性观念泛滥,见到同志错误不提、不批

评,怕伤和气,不如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不斗争,严重地妨碍了党的巩固和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形成了一团和气和平安居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莱阳二区非常严重^[6]。牟平九区在审查鉴定过程中,发现干部中好人主义思想严重,开会不肯提出意见来,不肯互相批评斗争^[15]。1943年威海县委对此指出:“干部对思想斗争很胆怯,一般都表现好人主义,一团假和气。”^{[28]19-26}

第三,和平麻木,家庭观念严重。胶东根据地的许多党员干部,借口家庭困难不出来工作与受训。牟平二区山前乡书记借口家庭困难,听说要提拔他便叫苦连天,不肯出来。老四区书记阴历年时将近一个月没回区领导工作^[15]。在工作中和平麻木思想非常严重,在莱阳许多干部几天没有听到顽军消息,就大意起来认为没有事了,听说顽军进攻了,咱几天没打胜仗,又恐慌起来了^[6]。在莱阳反“扫荡”时,周××自己挖了个洞躲起来,不领导斗争,还痴心妄想用选举方式把蒋介石选掉,就不用打仗了^[6]。招远在日寇投降后太平观念严重,麻木松懈,七区某干部到齐山店工作竟跑到外村看秧歌,一去三天不回工作岗位^[30]。

第四,狭隘妒忌,不配合工作。莱阳很多干部自己搞不好工作,也不想搞好工作,又不愿意和不甘心服从别人领导,就看人家不行。这种情况六区四区在审干前严重地存在^[6]。

第五,腐化堕落,搞女人。莱阳五区王××爱吃小吃,八九个月的时间仅买梨买花生、桃子等花费三百余元;一区李××同志不到一年已花北海币近千元;六区刘××同志贪污工人会费四百元。四区、八区、五区都有婚外乱搞女人的党员干部^[6]。在招远磨山区一个部门三个干部中有两个干部腐化不做工作;招城区、转山区都有腐化的干部存在^[30]。

第六,宗派主义严重、排外思想蔓延。莱阳在任用干部时许多党员干部就想不通为什么用党外人士干科长^[6]。而在南招县旗山区分区书记当工作不顺利、干部之间闹些小意见不团结时,不积极想法搞通思想,而是整天希望调换工作离开这个机关^[31]。

第七,感情用事,自私报复现象频发。莱阳五区丁××到恶霸家去喝酒,喝了酒还说:我喝了他的酒,立场可站得稳。五区于××几年前叫人家卖了驴,因环境关系未能给钱,今天得了地,向人家以投钞顶北钞,一个当的一个的要。一区周××因为

家里被别人占了一滴水的便宜,就没有心思工作了,天天讲到处想^[6]。

这些乡村基层干部的错误思想与倾向存在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许多基层党的干部受几千年来封建皇权思想的影响,从而导致他们在工作中出现贪污腐化等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传统的农耕社会生产状态与乡村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个人为中心形成了“差序格局”,每个人处于以感情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之中,基层党的干部来源于乡村社会,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干部出现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易于感情用事等错误倾向。

到1941年上半年,东海区各县党委都开办了训练班,共计开办训练班32期,训练了支部以下干部、小组长共计904人;差不多每月能开办四期,每月平均能训练150个党员干部;受训干部中有区级12名,支级427名,小组长和普通党员465名;训练数目以荣成、文登最多,牟海、牟平次之,威海最差^[13]。

我们从东海区干部受训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抗战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形下,中共仍对党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受训人数是非常多的。这对于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思想政治理论水平、觉悟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3年3月,鉴于胶东区党委没有给予开短训班的给养和教育费,牟平县委根据实际情形结合经费情形,决定开办轮训班。其方式主要是县委分区委的干部成立了联合巡视团,分头深入基层,普遍进行建立行政村工作;把党的普训工作布置下去,使其成为联合巡视团总的任务的重要部分;到各区去的干部组成三个到五个工作小组,一组有一个或两个讲党课的干部,工作组原则上每个村都能到。与此同时,县委也大量开办县级训练班,日期是半月;另外宣传部还派干部到四区五区去召开短训班,日期是七天^[15]。5月3日,县委召集了党政军民的干部及区级书记、区长、农青妇救会负责人等三百余人,传达了中央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决定^[15]。培训班教材以党性教材与民选教材为主,其他个别地区还有讲基本教育读本与十大政策等。根据学员水平的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组。其中甲组为高级干部。乙组的学习材料主要有《论持久战》与整“三风”文件,半个月都看了一遍,同时以党性教材为中心继续学习。丙组的学习材料是抗战道理与整“三风”文件,并

于每天上午的学习时间上文化课,每周两次(地理、自然、常识),其余时间是业务教育,学习了七期抗战道理,学习了六个“三风”文件。丁组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学习教育课本,以七分之三的时间学习生字,教育课本学习到十五课,识生字的一般能识八十到一百个,最多的能识二百多个。5月初对区级干部进行训练,由政府及全体政工人员共同推举委员9人组织成立整风检查委员会,按政府编制,以科处为单位,成立检查小组。委员会共计开会三次,第一次开成立会,研究讨论上级指示,布置了阅读文件的工作;第二次开会布置检查阅读文件及写笔记的情形;第三次开会总结阅读文件的效果。为了使训练更有成效,在区级训练班中还开展了小组与小组间的竞赛,条件是完成

学习任务,并能完全写笔记;同时也开展了个人与个人的竞赛:一种是本部门与本部门同志间的竞赛,一种是本部门与另一部门同志间的竞赛,条件是完成学习任务和写笔记。干部轮训后,为了巩固训练效果,还确定了周日两小时学习制度以及定期出壁报的制度^[15]。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党对干部的训练往往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训练与各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为了突出训练的效果,中共往往根据干部的级别、政治理论与文化水平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这样就保证了训练的效果。

除了对根据地干部进行训练外,牟平县还对敌占区干部进行了训练,其具体情形如表1。

表1 1941年9-10月份牟平县敌占区干部训练情形

单位:人

训练的情形	期数	九月份一期	人数	33	受训干部级别	乡级	3	小组	3
		十月份一期				村级	28	一般党员	2
	日期	九天							

资料来源:中共牟平县委《1941年10—12月至1942年1—6月(九个月)工作总结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档案馆藏,档1-1-5)。

我们通过表1可以得知,在极其紧张的形势下,中共仍坚持对敌占区党的干部进行了培训,这对于提高敌占区干部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坚定工作信心,克服工作中的不良倾向,推动敌占区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10月,胶东区党委根据胶东干部教育的实际情况,认为对分区级在职干部进行教育是干部教育工作中最弱的一环。因而,胶东区党委决定加强分区级在职干部教育。分区级在职干部以党政军民四个单位分别划分为四个学习小组,以整风教育为主要教育内容,同时还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在时间的分配上,整风课占四分之一,政治课占四分之一,文化课占四分之一。分区级在职干部以整风文件为学习的重心,其具体内容为区宣编写的整顿“三风”传达提纲、中央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调查研究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反对自由主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分区级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有时事问题与政策问题,具体的材料就是每期的党报党刊。党报应强调研究社论,党刊应强调研究重要的及与自己工作有关的文章。对于时事教育,除了阅读《大众报》的消息以外,还要系统地传达《大众报》上所载的半月时事述评。文化教育是分区级

干部学习的重要环节,必须经常有系统地进行。文盲同志需要学习识字,其他干部一概学习胶东社会及地理。胶东社会以林一山同志写的《胶东社会研究》为教材,地理以区宣翻印的《地理课本》为教材^[32]。

抗战胜利后,为了克服党内干部思想的混乱状态,黄县县委于1945年11月到12月25日共计一个半月的时间召开了县委训练班。其训练对象是由九个新解放区抽调而来的人员,多数为新干部。这次训练的学员共计57名。这次训练首先确立了组织领导,成立总支,总支下设两个分支,各分支领导三个小组,并由分支委员任小组长。训练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阶段七天的时间,进行单纯学习,并动员学员进行思想反省;第二阶段选择两个村进行工作实验,发动群众创造经验;最后六天时间进行整风反省。在训练过程中贯穿三个内容:第一方面是时事学习。这个内容是针对干部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混乱进行讨论与分析;群众工作的学习,使干部弄通弄懂为什么要减租减息,为什么通过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转变干部的群众观念,联系目前时局认识当前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整风学习主要联系时事认真反省,检讨学员的阶级立场,他们在群众工作中的表现以及日常的思想活动。学习的方式主

要有两个:学习时事是先由各小组提出问题,再根据提出的问题作一个初步的综合与分析,然后在小组讨论准备,最后进行大会讨论,讨论后再总结一下,学习其他的群众工作文件;在工作进行当中,每次工作回来都进行汇报检讨,研究讨论布置,下去工作,再检讨出优缺点,得出结论以作经验教训,也就是所谓学与做的结合^[33]。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战时中共对干部的教育与培训是一个系统连续的过程,针对干部队伍不断出现的问题,适时地对其进行教育与训练。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干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训练。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在训练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实际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与训练方法。训练的课程与时间也往往根据具体实际情形而适时做出调整。

在训练的过程中,每次都首先对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的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党员的基本理论素养,提高了干部的党性,这对于克服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其阶级立场与政治立场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斯考切波所讲的那样:“革命意识形态就走向前台,并为国家权力的重建和行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这些意识形态也迫使革命精英们积极宣传,发动民众参与政治斗争活动。”^{[34]270}

四、“三模”运动的开展

充分发挥模范的示范、先锋与骨干带头作用,是中共在工作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在根据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英雄模范,这些英雄模范涉及到根据地发展的各个阶段,涉及到根据地各行各业,也涉及到根据地各种角色。这些模范在工作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正是在这些模范的带动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才得以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在抗战期间,胶东区党委在根据地所开展的“三模”运动^①便是一场典型的模范评比运动,对于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在陕甘宁边区那样:“为了改进整个支部的工作,边区特别注意创造模范乡、模范支部,并不断总结模范支部的经验教训并推广之。”^[35]

“三模”运动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运动,三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牟平县委所指出的那样:

模范支部、模范党员、模范干部都是分不开的,没有模范党员便不会有模范

支部,同时没有好干部,模范支部创造也是困难的。因此,必须健全准备创造模范支部的干部,同时要抓紧几个对象创造一定数量(的模范党员)^[36]。

为了迅速地开展“三模”运动,掀起运动的高潮,胶东区党委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在党内广泛地传达与解释了“三模”工作的意义,再根据各区各种不同的情况确定模范条件。为了制造声势,牟平县委提出了很多鼓舞人心的口号,如“为争取模范党员而努力”“为争取模范支部而努力”“争取模范干部而努力”“在突击‘三模’工作中来保证全盘工作完成任务”,号召为创造模范而努力,为争取模范支部、模范党员、模范干部而奋斗。为了推动“三模”运动,首先在各区确定模范对象,再根据模范对象规定模范条件,最后再把模范条件在支部小组传达,由支部小组讨论。为了营造创模氛围,中共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如支部党员与支部党员竞赛、支部与支部竞赛、小组与小组竞赛,并要求掀起挑战的热潮。

在“三模”运动开展之初,党内有些党员干部对此认识不深入,甚至有所误解。如在牟平1941—1942年“三模”运动过程中,区级以上干部对创造模范工作认识不足,对这一工作抓得不紧,甚至忽视了领导。而一般党员则对这一工作有误解,如××区×乡的许多党员认为谁模范了谁就得多劳役,就是哪里工作好,那里就得多模范。二区姜格庄有的党员说:谁还敢模范,谁模范谁得糟糕,你看看大虎岚不是模范能遭到这样(因大虎岚工作活跃,惹起反动势力的仇视报告了丁部^②,丁部借口它不纳粮捉去五、六十人)。三区××同志说:模范有什么用,谁模范上级就调去了。八区有的党员说:谁模范,上级就要提拔谁。谁当模范就好调出去脱离生产了。甚至许多党员怕模范,谁模范就隔死不远了,叫敌人知道非捉不可(原因离据点太近,如果模范就必须负责任了)^[11]。因而对创造模范不积极。这些思想与认识的存在对于“三模”运动的开展显然是不利的,也与党开展“三模”运动的初衷和指示精神是相背离的。

为了使“三模”运动顺利开展,首先需要在党内打通思想,增强认识,在开展思想教育时往往结

^①党内的“三模”主要是指模范支部、模范干部与模范党员。

^②指胶东地区顽军丁纾庭部,笔者注。

合实际工作与民主改选支部来进行。如1942年3月,牟平县委就结合实行党内民选建立行政村支部的方法来推动“三模”运动,在各项工作上起了模范推动作用,提高了党员干部对这一工作的认识^[15]。

对于“三模”的条件,要根据实际情况,切合实际,牟平县委指出:

模范条件过高或不具体都会不容易做出成绩,不容易发挥其积极性。因此规定条件应根据情形,不要过高而且要具体明显,使他们容易做出成绩。如果这个条件做到了,可以再转变其他条件或提(高)一步,这样会使他们进一步,向更高的目标发展^[15]。

中共对于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三模”运动,根据对各种区域的控制程度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条件,如在牟平1941—1942年“三模”运动中,不仅行政区与争夺区条件不同,而且在行政区不同地区的“三模”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1941年10—12月,牟平模范条件是根据战争环境、工作情形来确定的。如一二三区环境较好,工作比较深入,其条件的确定是:(1)参军参战工作好;(2)党政军民的合作;(3)对其他工作做得好;(4)全体党员保证能参加冬学;(5)建立汇报制度;(6)保证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模范党员。四五六七八区环境比较恶劣,模范条件的确定是:(1)能动员敌区壮丁参军,注意××工作方式方法;(2)利用敌伪之名义开办冬学;(3)不动摇,不逃跑;(4)能够团结群众,随时揭露敌人的阴谋^[15]。

1942年1—3月份则根据战争态势的好转,县委对各区的模范条件进行了调整。如一区模范支部条件如下:参军参战工作好(能完成扩军任务,积极参加领导自卫团与游击小组);党政军民配合团结得好(能够做到斗争的团结,一元化的领导);对其他工作保证得好(如目前的春耕);坚持工作与敌开展不合作的运动;继续参加冬学识字班,每天能学习,读《大众报》,随时随地揭破敌人的宣传;要有五分之一的模范党员。模范党员的条件是:每天能学习一小时以上,能看报纸,文盲识三个字;能做春耕生产的模范;积极参加自卫团游击小组;深入领导群众,团结群众;执行任务坚决,服从组织领导。四区则根据实际情形条件有所改变,其模范支部的条件如下:执行决议,完成任务;党政军民密切联系配合;积极参加春耕,

掀起春耕热潮;能遵守各种制度,特别是学习制度;能批评斗争;要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模范党员。模范党员的条件是:四不怕(不怕参军、脱离、受训、负责);执行决议,完成任务;能在游击小组、自卫团里起模范作用;能积极参加春耕,成为春耕的模范;能积极批评别人,并接受别人的批评;学习积极,并能帮助别人学习。对模范干部一般条件的规定是这样的:思想意识上党性进步快;在领导上运用民主集中制,估计全面;坚持阵地,完成任务;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团结干部;学习积极并能帮助别人学习。在巩固的根据地,模范支部往往还有这样的条件:保证支部没有一个坏分子,按期进行审查鉴定工作。在工作薄弱的地区,模范支部还有这样的条件:能如期完成党员发展任务,并能注意发展的成分。敌我争夺区的支部特别强调与敌开展不合作运动^[15]。

在牟平反“扫荡”过程中,对于模范党员则根据其具体条件酌情来考虑,如在评选过程中就有如下的特殊情形予以关注:模范党员不“四怕”(叫他参军真能跟着走,给他任务不发愁,并能及时完成任务);在学习上有三个文盲党员,每人两月内能识180至200个生字;在自卫团群众团体中以及各种工作上,都能起模范作用;一般情绪高,领导群众也能完成任务^[15]。而在评选模范支部时则有如下情形:

铎疃村能领导群众和沐浴(村)的投降派斗争,不供给他们粮草,投降派虽去捕捉抢掠,并不屈服,村支部还能给群众解释。

××村一带劳二区××村党能领导群众反“扫荡”,站岗、放哨,空舍清野做得彻底,晚上在山里睡。

五区劳役过重,支部能在群众中解释,并能安插伤号,搬运给养,空舍清野,打狗站岗、放哨等工作中起模范作用。阴历年时召开生活检查会,先以家庭为单位开,再以合族为单位在家庙里开检查总结一年来的生活(搞农业生产、家庭管理等)的优点,提出今后的意见,这是个新的创造,以这种形式代替了单纯的烧香磕头、会聊形式。老头们还挺高兴的。

八区××村支部动员贫富农互济,地主自动地交出几亩地来不要租子,分给

抗属、贫农耕种。同时虽近敌区却能掩护工作人员,虽受打击不灰心动摇^[15]。

我们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中共在胶东根据地开展“三模”运动的过程中,其条件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具体而又实际,多接近于根据地日常生活,在实施的过程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且易为根据地党员、干部与支部所接受。这对于“三模”运动的开展及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模范的条件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具体的工作、环境的改变以及战争局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如1942年4—6月份牟平在“三模”评比中,针对具体的工作比1—3月份增加了如下条件:模范支部增加了扩军工作做得好,能做到不打折扣,如期完成任务等要求。在麦收工作期间,增加了支部要保证得好,要能动员老百姓速割速打速晒速藏,使之不受一粒的损失,还要动员征收公粮等要求。党员在麦收工作期间增加的条件是:麦收要成为劳动英雄,征收公粮自动先纳^[11]。在大整训期间,模范干部的条件如下:民主作风行;模范作用;学习时事、业务积极,头脑清醒,工作有办法;领导本村、本区、本县整训有显著成绩者;肃匪、反特、防奸有特殊成绩者。而在“三模”运动过程中不仅看模范的固有条件,而且更看重其进步速度。如在1942年4—6月创模过程中,因一区泊儿村与桂家庄竞赛,在一二三月份泊儿村是模范,在四五六月份确定桂家庄为模范,原因是该村进步得快^[11]。

我们通过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中共的“三模”运动的开展是非常广泛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工作中,“三模”运动的条件是不断变动的,这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三模”运动,使运动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效果,进而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共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精神。

模范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1945年春节,牟平各级党委召开“三模”、劳动英雄等座谈会,进行了比一比的教育,带头进行拥军优属等活动^[37]。战时,尤其是在敌我斗争比较残酷的环境下,各类模范往往成为敌伪打击与迫害的对象,这就增加了中共在乡村基层创模的困难。乡村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熟人社会,“三模”运动的开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将在战时表现积极的党的干部与党员推向了前台,也在某种程

度上使他们暴露在敌人面前。因而在“三模”运动过程中,无论是党员还是干部对此还是存在一定的忧惧心理的。

各类模范尤其是模范干部与模范党员往往成为中共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在战争态势未明、前途未卜的形势下,由于受传统乡村社会习惯的影响,乡村民众视出外为党工作为畏途,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胶东基层档案中记录了乡村民众调离村庄前往他处工作,如调动、提拔而表现出来的惊恐与畏难情绪。这些就表现在中共在基层开展“三模”运动过程中,基层支部、干部与党员表现出来的消极、动摇的态度与情绪。正如牟平县委在创模运动中所指出的那样:

对于创造模范的困难,一般的是干部对于这一工作还认识得不够,没能详细地对下级解释,经常去巡视帮助他,以致下级同志不了解,认为这一工作就是物色干部的一个办法。其次就是一般党员不愿争模范,表现在挑战时迎战的很少^[11]。

这些无疑增加了中共在乡村基层创模工作的困难,首先就表现为干部对这一运动认识不够,从而导致在工作态度上的犹豫彷徨。干部对这一工作不积极,也不帮助一般党员,在心里害怕进步怕当模范。

在一些创模运动较好的地区,也有将劳役推向那些条件较好的支部、干部、党员等现象,从而造成了这些支部劳役过重,对此党员感到应付不暇。在“三模”运动过程中,某些地区不顾自己的条件与环境,只是机械地照搬上级评选模范的条件,导致条件过高,如牟平二、五区在1941—1942年创模运动过程中就出现了条件照搬其他地区的情况,导致党员干部态度消极,使这一工作没有取得好的成绩^[11]。

在对创模运动的领导与布置上,很多地区缺乏具体计划与布置,没有经常检查,没有按期总结,没有表扬鼓动,没有明确的奖惩,没有掀起热烈竞赛,没有顾及他们的困难问题,在评选过程中往往采用“选皇后”的方法,从而使这一运动出现了偏差^[15]。

面对此种情形,中共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相应措施。首先,加强了对基层创模活动的巡视检查工作力度,来推动乡村基层支部的创模运动。明确提出动员口号,配合竞赛奖励是发挥干部们开

展“三模”运动积极性的有效办法,有利于引导“三模”运动回归正确的导向。其次,就是在创模运动过程中抓紧对象,开展竞赛,按时检查,优点予以发扬,缺点马上纠正,按期总结,从而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最后,为了使创模运动顺利开展,在必要的情形下可以固定一定的模范支部、干部及党员,以利坚持工作。

在胶东抗日根据地,“三模”运动的开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三模”的条件是随着根据地的工作与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但“三模”运动的目的自始至终是一致的,就是更有效地推动中共在基层的各项工作。根据地党内“三模”运动同中共在根据地推行的各类劳动模范、典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此苗春风认为:“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权威机构常常通过树典型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激励、鞭策、引导和推动人民大众,树典型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方式。”^{[38]74}

模范党员、模范干部与模范支部在根据地抗日与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带头与示范作用,也是中共在基层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者,通过树立英雄模范,在具体的日常工作中将中共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贯彻到乡村社会的每个角落。“三模”的内容和标准是跟党在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和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根据地中心工作的变动而不断地发生变动。如牟平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的冬学运动中为了保证其顺利进行,牟平要求模范党员与模范干部在参加冬学方面起模范作用^[15]。但无论如何变动,“三模”成为中共在基层意志的集中代表者,在各类中心工作中起着引领作用,有利于带动农民逐步进入政治活动的中心,“党和国家的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意志也步步深入地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39]75}。

干部队伍建设是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健全干部队伍,发挥干部在抗日与革命中的作用,中共采用了多种方法与途径来完善干部队伍建设,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体系。这不仅对于发挥干部骨干作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共政策得以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基层,有利于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及解放区。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首先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整训党的干部。”^{[39]369} 吴晓亮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干部选拔任用、管理教育、考察调配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对党执政后的干部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40]

参考文献:

- [1] 沙培德.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G].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 [4]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G].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 [5]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胶东抗日根据地文献1(下)[G].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6] 中共莱阳县委. 一年来组织工作总结[A]. 莱阳市档案馆藏:档1-1-1.
- [7] 林浩. 胶东党的建设问题报告提纲[A].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24-1-1-1.
- [8]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胶东抗日根据地文献1(上)[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9] 中共招远县委. 招远县委组织科一年来的工作总结[A]. 招远市档案馆藏:档1-1-62.
- [10] 中共牟平县委. 中共牟平县委关于反扫荡工作的总结[A]. 烟台市牟平区档案馆藏:档1-1-8.
- [11] 牟平县委组织部. 一九四二年四五六三个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A]. 烟台市牟平区档案馆藏:档1-1-6.
- [12] 岳谦厚. 边区的革命(1937—1949)[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13] 东海专署. 1941年上半年党内教育工作中报告[A]. 荣成市档案馆藏:档1-1-1.
- [14] 中共北招县委埠山区分区委. 招北埠山区一月来的保运总结[A]. 招远市档案馆藏:档2-1-21.
- [15] 中共牟平县委. 1941年10—12月至1942年1—6月(九个月)工作总结报告[A]. 烟台市牟平区档案馆藏:档1-1-5.
- [16] 中共北招县委. 北招五年来的组织工作总结材料[A]. 招远市档案馆藏:档2-1-81.
- [17]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G]. 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1982.

[18]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9]山东省档案馆.胶东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1)[G].北京:中华书局,2020.

[20]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档案局.红色记忆[Z].烟台:黄海数字出版社,2013.

[21]黄县敌游区工作报告[A].山东省档案馆藏:档2-1-206.

[2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1卷[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23]邹说.中国革命的再阐释[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5]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7]中共黄县县委.黄县丰仪区支部情况[A].龙口市档案馆藏:档1-1-22.

[28]威海市档案馆.威海抗战史料汇编[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29]邵×光.打人后的几个问题[A].招远市档案馆藏:档2-1-91.

[30]中共招远县委.县委目前关于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指示[A].招远市档案馆藏:档1-1-5.

[31]南招县委组织部.土改保田运动中党员发展情况[A].招远市档案馆藏:档1-1-63.

[32]中共胶东区党委.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分区级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A].山东省档案馆藏:档24-1-374-1.

[33]黄县县委.黄县县委训练班工作总结[A].龙口市档案馆藏:档1-1-14.

[34]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5]张国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支部建设[J].兰州学刊,2009(4).

[36]中共牟平县委.中共牟平县委关于组织、精兵简政、对敌斗争工作的总结、报告[A].烟台市牟平区档案馆藏:档1-1-6.

[37]中共牟平县委.1945年上半年对敌斗争工作总结[A].烟台市牟平区档案馆藏:档1-1-29.

[38]苗春风.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3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40]吴晓亮,吴敏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历史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09(6).

Study on the Problems of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in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GUAN Qinji

(Yingke Law School,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wartime, and the cruelty of the wartime environment unavoidably causes the phenomenon of “cadre shortage”.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cadre team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cadres in the resistance of Japan and revolution, the CPC adopts various methods and ways to improve the cadre team and establishes an effective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cadres’ allocation, training, promo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ransfer and education, etc., with the wide content. This not onl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giving play to the cadres’ backbone effect, but also enables the CPC’s policy to be implemented at the grassroots without difficulty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nti-Japanese bases and achieving the final victory.

Key words: Jiaodong anti-Japanese base; cad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ection; training

(责任编辑 雪箫)